

序

邓旭初同志早年奔赴延安参加革命，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中浴血奋战，新中国成立后转入高校工作。邓旭初同志追求真理，经历充满传奇。经多年努力，《敢为天下先——邓旭初传》即将付梓，为我们回眸历史、总结中国高校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和存史咨政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也为我们开展革命传统教育，让更多的青年学生了解中国现代史提供了一份生动、形象的教材，所以我很乐意为本书作序。

邓旭初同志的传记以他个人的经历，反映出一段漫长曲折的历史。邓旭初同志生活在中国现代历史的社会变革转折时期，这一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由弱到强，领导中国人民赢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胜利，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是从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期；是改革开放、民族振兴、大力开创国家现代化的时期。邓旭初同志的传记生动地展现了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抬起头、站起来，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做出的艰辛努力和伟大成就，具有很强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邓旭初同志的传记同时展现了一个知识青年在时代与历史的大潮中，走向光明、走向真理，并

充分体现了人生价值的道路。渴求建功立业、实现人生价值,也是当代青年最关注的问题。邓旭初同志那一代人年轻的时候,在党的领导下,为挽救民族危亡、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和建设新中国而奋斗,承担起了一种伟大的历史责任。当代青年,在党的领导下,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也是一种伟大的历史责任。任何历史和时代都会给予每一位当代青年以人生选择和考验,关键是我们如何去面对选择和接受挑战。邓旭初同志的经历对我们的启示是:只有把个人的抱负与祖国的命运结合起来,把个人的成长与民族的振兴结合起来,把个人的追求与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历史活动结合起来,才能志存高远,胸怀宽广,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广阔舞台上,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展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业绩。

邓旭初同志的传记中有相当的篇幅记载下了他从1954年调入上海交大后所经历的重大事件和感受,尤其是在他担任上海交大党委书记的十年中,团结带领党委一班人,抓住机遇,锐意改革,促进发展,为上海交大重铸辉煌所作的大量奠基性工作。传记不仅记录了改革过程中中央和地方各级领导同志对上海交大的关心和支持,而且翔实地记载了改革的艰难和发展的轨迹。以史为鉴,它将对上海交大的改革发展提供参照和启迪。改革开放20年是上海交大百余年历史上发展最快的时期。回顾改革之初的艰辛、曲折和不断取得

的巨大发展,将更加坚定我们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把上海交大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决心和信心。

此外,这本传记文风质朴,叙议结合,可读性强,希望它能成为高校师生和广大青年朋友们的良师益友。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 王宗光

2003年8月

敢为天下先

——邓旭初传

刘自勋 许寅 撰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邓旭初同志早年奔赴延安参加革命,先后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的战火洗礼。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在高校工作,20世纪50年代初在南京参与领导筹建华东航空学院(现西北工业大学前身),1954年春调入上海交通大学,历任校长办公室主任、党委副书记和副校长。1977年至1986年,邓旭初在担任上海交大党委书记期间,率先试行高校管理改革,定岗、定编,建立岗位责任制,鼓励人才流动,进行自费工资改革,不拘一格选用人才,这些举措,推动了全国高校的内部管理改革,得到了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肯定。

邓旭初同志追求真理、人生经历充满传奇。本书反映了一段漫长曲折的历史,展现了一个知识青年在时代与历史的大潮中,走向光明,建功立业,充分体现人生价值的道路。全书文风质朴,叙议结合,可读性强。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人生的起步	1
1. 童年的磨难	1
2. 追求光明	5
3. 奔赴延安	12
第二章 一生的转折	19
1. 光荣入党	19
2. 到新四军去	23
第三章 经历“皖南事变”	26
1. 事变发生	26
2. 被围、突围、受伤、被俘	27
3. 斗争在敌人的伤兵医院里	31
4. 在第十一卫生大队逃离虎口	46
第四章 千里寻“母”	53
1. 风雪皖南山区	53
2. 从金华到丽水	65
3. 结识余森文专员	68
4. 到景宁县政工室	70
5. 赵国琛“白皮红心”	73

6. 天目山遇险	76
7. 在松阳第二保育院	79
8. 终于回“家”了	82
第五章 智斗凶顽	86
1. 从整风运动到抗战胜利	86
2. 在争夺受降权的斗争中	88
第六章 与沈锐喜结良缘	112
1. 在蒋军重点进攻中	112
2. 初识沈锐	113
3. 山东重逢 情芽初萌	116
4. 谷牧为媒 喜结良缘	117
第七章 血战疆场	121
1. 同大炮打上了交道	121
2. 从淮海战役到渡江战役	122
3. 血战高桥解放大上海	124
4. 改造董部 大获成功	125
第八章 挥师朝鲜	127
1. 一个好政委	128
2. 钢铁运输线上的英雄们	130
第九章 转战高教战线	135
1. 实在舍不得脱下军装	135
2. 创建华东航空学院	137
第十章 到交通大学	140
1. 巍巍学府,百年老校	140

2. 任校办主任·····	143
3. 在交大西迁及多次运动中·····	147
第十一章 “文革”中的蹉跎岁月·····	153
1. 接受审查·····	154
2. 家破人亡·····	155
3. 被隔离·····	157
4. 走出隔离室·····	163
5. 可怜天下父母心·····	164
6. 担任后勤组长·····	168
第十二章 改革的春天·····	170
1. 受命于危难之中·····	170
2. 突破“两个估计”·····	171
3. 打破“唯成分论”·····	176
4. 拨乱反正·····	181
5. 分“讲师楼”·····	184
6. 建立校务委员会·····	186
7. 解决学校归属·····	188
8. 发展多种学科·····	194
第十三章 访美·····	201
1. 组团·····	203
2. 敞开彼此心灵·····	205
3. 寻找双方差距·····	209
4. 突破“两人同行”·····	210
5. 坚持如实汇报·····	211
6. 开辟交流渠道·····	212

第十四章 管理体制改革	217
1. 搭班子	219
2. 人才交流	222
3. 定编与制订教师工作规范	228
4. 发奖金	232
5. 自费工资改革	240
6. 扩大基层自主权	245
第十五章 改革的延伸	252
1. 兴建科研中心	252
2. 促进产学研结合	257
3. 联合办学	265
4. 引进外资办学	269
第十六章 “伯乐”相马	275
1. 越级提拔佼佼者	275
2. 青睐“有争议”的人物	278
3. 看上“高参”	282
4. 广纳贤才	287
第十七章 筹建闵行校区	290
第十八章 重振交大雄风	294
第十九章 离休后的日子里	298
1. 心系交大	298
2. 为沈锐同志树碑	299

附录	302
《光明日报》与上海交大的情愫	302
人生多坎坷——记沈锐	312
主要参考文献	326
后记	328

第一章 人生的起步

1. 童年的磨难

1921年农历大年三十的早上，邓旭初出生在广州静慧街杨家巷一间贫民居住的古屋里。这个家，是个复杂的大家庭：一个父亲，两个母亲；先合后分，分而复合。生母是妾，他是“庶出”。



大母黄氏是个“恶婆”，却掌握着全家主要的财权，

邓旭初之父邓文业

父亲见她只好礼让三分。生母唐氏，是个典型的贤妻良母，尊夫如天，事大母也曲尽妾礼。但是，大母却视他们母子似仇人。邓旭初的同母兄弟姐妹一共6人——4男2女，随生母生活，从小吃足了苦头……

邓家是旧社会典型的封建式大家庭。邓父名文业，从小学雕花板手艺，技术相当高超。广东中产以上家庭，筑屋造房总要在梁柱、门窗、板壁等处，雕刻



邓旭初之母唐秀英

各种图案。从事这一手艺的,大多代代相传。文业公以上,是否有家传,现无从考证,不知文业公这门手艺学自何处。不过,这位手艺人,有一个很大的特点:重视知识,重视读书。自己虽然从小学艺,却爱好读书,学识相当丰富,还懂点医道。广东是华侨之乡。邓氏原籍开平县护龙乡,也是个侨乡,旅居美国谋生的不少。文业公青年时期,先娶黄氏,生男女各一。不久,便远渡重洋,到美国底特律打工。美国人没有在住宅雕花的习惯,他的手艺只好搁起,改到一家中药店任职。幸亏他学识丰富,懂点医道,还写得一手好字,所以担任了开方、撮药、提供医药咨询3种工作,受到店主信任。他省吃俭用,有点

积蓄,就寄回家,由黄氏经手,添置些田产房产——这也是邓家财权旁落的根子所在。文业公是一个很有爱国热忱和民族自尊心的中国人。旅美多年,亲见、亲闻、亲历美国社会种族歧视的种种现状,深感不平。在自以为略有些资本之后,便毅然回国,定居广州。岂知原来想集资自办实业的梦想很快落空;身为“金山客”(广东人对旅居美国华人的尊称),又不甘心重操旧业,不上不下,只好失业。

文业公回来不久,便蒙受重大打击,已经结婚的长子和女儿不幸早亡。眼看将无男继后,心中无限惆怅。中国人从来讲究传宗接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不仅士大夫视为圭臬,一般老百姓也当作天经地义。眼看黄氏再育无望,为免邓家绝后,斟酌再三,决定娶妾。经过七个弯八个转,邓旭初的生母唐氏,便成邓家之妾。

唐氏举止端庄大方,待人和蔼可亲,相貌清婉娴静。其父原是清朝驻越南军队的一个小军官。回国后不幸早逝,撇下妻女两人,无依无靠。唐氏从小受过良好教育,知道生处逆境,母女二人相依为命,如果自己不做出牺牲,母女便会沦落。恰逢有人为邓文业说媒,讲明为妾,目的生子。邓家当时还

算小康，文业公虽已壮年，人品不错，待人诚恳，唐氏母女也就允了这门亲事。

唐氏初入邓门，大妇黄氏知道邓氏子息事关自身利益，所以开始尚能相安无事。岂料进门不久，黄氏竟先产一男儿。这下形势突变，黄氏后顾之忧，便生逐妾之心。自此，轻者朝夕絮聒，重者打骂随时。文业公处于两妇之间，明知唐氏受屈，却也无力庇护。唐氏母女不堪凌辱，1919年搬到广州杨家巷自立门户。

从此，文业公往来两宅，尽管一周来杨家巷两三次，每次不过住一天半日，即匆匆而去，对唐氏母女也还有点照顾。然而唐氏竟接连怀孕，到抗战前夕，已有四男二女。在此10年间，唐氏母女主要靠自己养活自己。唐氏刺得一手好绣，便以卖刺绣戏装为主要生活来源。刺绣收入微薄，为了维持一家生活，她总是夜以继日，不停工作。即使在生邓旭初的弟弟的前一分钟，还在刺绣，可见其辛勤如何！唐母也亲自动手制作纸盒，略赚些钱以助女儿。论理，这一家自食其力，对黄氏这个“大房”，毫无负担，毫无威胁。可是黄氏嫉妒成性，妒心一起，便会不问情由，赶到杨家巷寻衅，见物就砸，见人就打。唐氏只是忍气吞声，不加反抗。倒是几个子女见状不服，有时反抗。时隔六七十年，邓旭初至今还记得这位大母撒泼的情形：有一次，竟拿了开水，往姐姐身上浇，幸亏逃得快，没有烫伤。又有一次，年仅五六岁的邓旭初目睹黄氏打自己母亲，实在忍无可忍，便在黄氏背后捅了两拳。黄氏大怒，转身追打，唐氏在后面呼喊“不要打我儿子！不要打我儿子！”因为唐氏贤惠，常被黄氏打得鼻青脸肿，子女们个个恨恨不已，皆称之为“恶婆”。但是，只要这个“恶婆”不来，一家人各尽所能，收入纵然仅够糊口，天伦之乐却依然存在。

1925年前后，黄氏返乡掌管田产，文业公才与唐氏长居。不久，全家从杨家巷搬迁到花塔街一间古屋。从此，唐氏停止刺绣戏装，帮一家叫周中亚织造厂的厂家，印刷汗衫商标号码。全家都参加这一劳动，收入不多，却相对稳定。家庭开支，除了偶然动用部分文业公积蓄，所得尚有少许可以存在周中亚厂内。这样一直持续到1937年。其后，积蓄眼看将尽，所存工资也所剩无多。一家生活，愈来愈艰难，9口之家连个温饱也难维持，只好将唐母送进养老院。大姐邓芝梅刚读师范初三，也只好辍学，到荫南小学当了教

师，贴补家用。

既然家庭贫穷如此，为什么尚能送子女上学？邓旭初说：“我父亲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重视知识，重视子女上学。他曾经说过，‘即使家里穷得只有一笔管筒米，也要让子女上学读书。’所以家庭即使真正穷得只有‘一笔管筒米’，他也坚持让子女上学，大房、二房一律平等。当然，‘一笔管筒米’，终究难以让子女坚持学业，所以姐姐芝梅未读完师范初三，便只好辍学了。

进入 30 年代中期，周中亚织造厂印刷商标号码的整批生活，已经没有了，只剩些钩夹骨、打钮门、钉钮扣之类零碎活，自然工资愈来愈少；大姐教书收入，还不到 20 元，加在一起，也难养活全家。只好继续提取放在厂里的工资积累部分，以作弥补。唐氏有时还做些炒米饼，不顾面子，在门前摆摊，售与路人。

生活困难到如此程度，这位贤妻良母，依然敬夫如天，尽可能做些好菜供养丈夫。邓家子女，在这位好妈妈的熏陶下，个个从小参加劳动，抢干家务，为母分忧。邓旭初是长子，他一面上学，一面劳动，一面还帮助做家务：不仅干扫地抹桌之类粗活，居然还能做菜。直到今天，他还能烧出可口的蚝油牛肉之类，广东味十足。这就是青年时期为了伺候父亲而从母亲那里学来的。

正在全家苦苦支撑之际，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1938 年春，年方 17 岁的邓旭初立下奔赴延安、追随共产党抗日的志愿。贤德的母亲不但没有阻止，还取出存于周中亚织造厂的最后一部分工资，交与儿子做路费。文业公此时已经病重，也勉励儿子好好抗日。临别，唐氏还将文业公给她的惟一珍贵物品——一只金手表，交与儿子，以备不虞之需。自己则带着留下的五个子女，护送病中的丈夫，两手空空，逃难回到开平县护龙乡。途中已经沦为乞丐了！

1939 年，文业公病逝，一家 6 口，生活无着，几次向大妇黄氏要求分地耕耘，均遭拒绝。不过，一笔写不出两个“邓”字。文业公虽已病逝，唐氏及其子女作为遗属，要求分其财产，黄氏也难一毛不拔。最后，从“甩包袱”这个目的出发，总算“借”了半亩田（当地称为一斗八升）给他们耕种。这区区半亩，岂能养活 6 口之家。唐氏生性善良，也不想与黄氏争产，始终咬紧牙关忍受。大姐芝梅又设法找到一个乡村教师的职位。大弟弟帮人家打工。

两个小弟弟,只得被送进难童院。唐氏则带了最小一个女儿,亲自耕种这半亩薄田,还到附近三圭山上,开了一片荒地,种上红薯。作为母亲,在送两个儿子进难童院的时候,也像当年送老母进养老院一样,心似刀割。然而,这两个孩子在难童院中,受不了折磨,居然一前一后逃回家中,以贩卖甘蔗、咸菜之类,挣几个钱,吃一碗薄粥汤。生活实在艰难。唐氏曾经想把最小的女儿送人,以免挨饿。可是两个哥哥却苦苦哀求把小妹留下。结果,全家抱头痛哭……从1939年到1949年这10年漫漫长夜,唐氏和子女生活虽然苦不堪言,一家骨肉却免于离散。

邓旭初至今记忆犹新:“最难能可贵的,是我母亲的宽阔胸襟:我大妈待她如此刻薄、狠毒,她却始终不记恨在心。回乡几年以后,黄氏患病,我母亲居然肯亲自服侍,细心周到,殷勤热情,比亲姐妹还亲。亲戚邻里,无不称赞。就是我大妈本人,也深受感动,最后讲了一句良心话:‘你比我亲妹妹还好,过去我真是对不起你们!’”

邓母唐氏晚年和邓旭初一家安度,直至1958年逝世。

2. 追求光明

广州是国民革命的策源地。国共合作开展的大革命给穷苦老百姓带来了光明与希望。这对邓旭初的青少年时代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回忆说:“我怎么会走上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道路呢?其实,与革命队伍中的大多数知识青年一样,是时代的必然。这个必然,包括两方面的因素:一个是阶级压迫,一个是民族压迫。我们在大家庭内部受大房的欺凌,从小就印在心坎里,跟着妈妈过着城市贫民的生活,处处感到压抑、不平以至愤慨。在这多重压迫下,本来就有渴求翻身解放的强烈愿望。抗日战争一发生,日本鬼子打进来了,更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这沉重的民族压迫,压得绝大多数中国人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愤恨满胸膛,只要有人启发、引导,便会走上反抗的道路。”

邓旭初为什么不跟国民党走,要跟共产党走?当时有许多知识青年投笔从戎,从的是国民党的军队。最吸引人的一条路,就是投考黄埔军校(此时已改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黄埔”这个名字,当时是很响亮的,尤其在广东影响更大。不要说国民党身居正统,有“黄埔身份”,马上成为“天子门

生”(蒋介石任黄埔军校校长),前途自然坦荡,而且待遇不知要比“走延安”好多少倍——“走延安”,连路费也得自备。迢迢数千里,交通阻隔,行旅艰险,到得了,到不了,固未可知;即使到了,住窑洞,吃粗粮;然后,打游击,走四方,面对的是最残忍的敌人,随时可能牺牲。这两种前途、两种选择,对于抗日青年及其家长来说,何去何从,答案仿佛简单。但是,当时的青年知识分子甘冒生命危险,不计个人前程奔赴延安投共抗日者,数以万计。邓旭初就是其中之一。

同任何革命者一样,在投身革命之前,必有一个启蒙时期。邓旭初接受共产党启蒙较早,因为他占有一个地理优势——生于广州,长于广州。广州,正是我党最早的革命发祥地之一。还在1927年11月,邓旭初未满七岁,张太雷、叶挺、叶剑英等同志领导的广州起义时间虽短,却在邓旭初心目中种下了革命的火种。邓家所在地,是贫民区,也正是起义队伍重点宣传区之一。邓旭初至今还清晰地记得,起义后的一天中午时分,有两位同志来到邓家。他们身穿便衣,身挂红带,肩背步枪,态度和蔼,宣传革命道理,话儿不多,却深入人心,连他这个孩子也听得懂:“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工人队伍。我们是为劳苦大众办事的。以后,欠租的不要交租,欠债的不要还债……”那年代,邓家过的已是城市贫民的生活,对于这种宣传自然听得进去。

邓家在花塔街的住宅,后门通向一片堆满瓦砾的野地。广州起义失败以后,这块野地也就成了敌人屠杀革命志士的刑场。碰到反动政府杀人,邓旭初往往透过阁楼上的一扇小窗,远远眺望。有时候还能够听到志士们临刑前呼喊的口号声。这种壮烈场面,对于大多数群众来说,不但起不了震慑作用,而且容易引起人们对烈士们的同情,连小孩也不例外。广州起义失败后,革命志士惨遭屠杀,多数市民都感到惋惜,背后纷纷议论:这些共产党都是好人,是为我们穷人拼命的,为什么要杀死他们呢?

这些想法,也恰恰是邓家一家人的想法。后来,邓母在遭受艰难困苦的时候,就曾经多次发过牢骚:“共产党当家,就好了,我们穷人就不用吃苦了!”对于少年邓旭初来说,母亲是自己最崇拜、最信任、最敬爱的人,她的话,一字一句都会刻进他的心坎,永不忘记。

压迫愈深,反抗愈烈,这是反动派永远无法理解的客观规律。劳苦大众

饱受压迫、剥削、欺凌，渴望翻身解放。反动派能用枪杆子残酷镇压革命者，而革命者的血却会在劳苦大众的心底深处，埋下革命的种子。有朝一日，它会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少年邓旭初幼小的心里就播下了广州起义革命志士鲜血培育的种子，到抗日战争——正好 10 年，它开花、结果了。

邓旭初 7 岁（1927 年）上学，进的是花塔街市立小学。尽管年幼，却知道家计艰难，母亲供养自己读书极不容易，因而学习非常自觉、刻苦，成绩年年优秀。这时期，正是十年内战的前半段。“四·一二”大屠杀、广州起义，已经为他启蒙，开始对革命与反革命两大阵营有了朦朦胧胧的认识。接着，国共两党又在“围剿”与反“围剿”中拼死斗争。1931 年，“九·一八”事件发生了，日本人打进了东三省，侵吞了热河，全国人民开始奋起抗日。蒋介石却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对红军围剿不止。

1933 年，邓旭初 13 岁时，升入国民大学附中，成了一个初中学生，对国家大事非常关心。他耳闻目睹广东人民生活在反动统治下，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苦不堪言。与广大人民的苦难恰成反照，反动军阀及其大大小小走狗们，花天酒地，穷奢极欲，其腐化堕落的程度，远较历代统治者有过之而无不及。当时革命尚处低潮，老百姓不敢言而敢怒。愤怒至极，自然众怨沸腾。“瓶口扎得住，人口扎不住。”即便你“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大小统治者的种种劣迹，还是通过各种渠道的“窃窃私语”，广泛流传于民间。邓旭初尽管还是个少年，穷人的孩子政治嗅觉相当敏感，什么地方闹饥荒，穷人只能吃草根树皮以至观音土啦；当官的敲诈勒索，剥削穷人，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绫罗绸缎啦；某某县长、某某区长，都是饭桶，乌纱帽全靠钱买来，所以更加贪得无厌啦；某某穷人的老婆，被一个当官的王八蛋看中，强行抢去，打官司没赢，只落得倾家荡产啦；某某大学生，因为毕业后长期找不到职业，只好逼得自杀啦，等等，常在他和穷苦学生中传来传去。尤其是“毕业即失业”这个普遍的社会问题，更使他们忧心忡忡，对自己的前途，丧失信心。邓旭初就是这类贫苦学生的典型人物。应该说，初中三年，是他从朦胧觉悟，逐步进入爱国热情高涨、具有初步分辨政治是非能力的一个转折时期。

在那个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都空前激烈的年代，青年，特别是其中的高中生和大学生，是最敏感的群体。埋在邓旭初心中的革命种子已经在初中时代抽芽。由于积极投入爱国斗争，时间稍长，便受到了地下党的阳光雨